

回憶孫本文老師

吳自甦

頃讀中外雜誌郭驥先生所撰「孫本文老師的風範」，對孫老師在中國社會學開創建立的貢獻，述論甚詳；筆者謹就所知，略作補充，藉表崇敬懷念之忱。

我於民國卅五年考進了嚮往很久的中大，由農學院的農業機械組，轉入社會學系，當時的想法是：國家的根本在社會，社會問題不能妥善解決，事事將會落空。同時為仰慕孫本文先生的道德學問，希望在大師門下受教，就這樣我終於跟社會學結緣，卅多年來的教學、寫作生涯，一直受益於孫先生的學術思想，和「循循善誘」的影響。孫老師在中大社會學系是教授兼系主任（我們同學對他的暱稱是「系老板」，因為他在我國社會學界有權威著作，也是一位位居前輩的學者）教授兩門主要的課程：普通社會學、社會心理學，孫老師雖著有「社會思想」、「現代中國社會問題」，但並未親自講授，也許這樣才能有多餘的時間和精力，從事研究和著作；更難得的是他並未擔任所謂「導師」或「主任導師」，然而他却常常定期招約學生座談，有一次助教通知本班：「系老板約在明天——星期天下午談話」，可是我跟同學早先有約在玄武湖開會，為對付職業學生把持「五二〇」開學潮的晚會，考慮再三，竟沒應主任之召，內心委實「兩難」。第二天——星期一上課，孫老師指問昨天那裏去了，我支吾其詞，未敢作答，他那一襲藍布長衫，嚴肅

又帶慈祥的面容，透過圓邊眼鏡，炯炯發光的眼神，告訴我：「下次要先請假」，於是他就從容不迫的整理一下上課資料——卡片，安祥的走出教室，從此以後我對孫老師的「背影」，更加親切、難忘！民國卅八年春天，南京已成「危城」，蔣公介石引退，行政院長有人為其拆字「欲和（禾）無口，欲圖（斗）無門」。共軍南侵，首都人心惶惶，而遷校的議論未定，孫老師以他的身份、地位原是必要追隨政府離校的，然而表面上他又得維持安定的局面，因此當我們毅然出走，幾乎是「不告而別」，想像中他必然要追查不已的。那知我和伯翰、樹松（已逝）學長在江西南昌「青雲譜」道觀客旅，給孫老師寫信求救，藉口想轉學廣州中山大學（該校有「社會學系」），沒想到在危城弦歌未輟的系老板，會手覆快函，而以某某「學兄」相稱，此時益使我們汗顏萬分，最使我們心痛的是，還未及陳覆，南京撤守，江南之春，黯然失色，而輟水悠悠，恩師別矣！在臺灣間或聽到一點孫本文師的消息，他原本是将師母送回吳與老家再作南遷之計的，之後中大校名被取銷，社會學系也被取銷，共黨認為他教授和主持的是「資本主義的社會學」，但對孫老師似乎並沒像對史學家繆鳳林先生送到東北勞改，也似乎沒見報導孫老師被鬪爭、坦白，當然孫老師從此「默默無聞」，既無聲息也無著作發表了。直到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國社

會學社在臺北召開年會，曾任中大社會學系的美籍神父郝繼隆教授（已逝）告訴我們，由美國輾轉得來的消息：「孫本文先生已於兩週前，在南京近郊逝世了。」推算孫老師逝日可能是三月十一日，享年八十有餘。孫老師有一位公子，曾在臺經商，後遷香港，郝繼隆與他已無連繫。關於孫老師謝世，在臺系友如朱岑樓兄（曾任臺大社會學系主任）、席汝楫兄（曾任東海社會學系主任）、王維林兄（曾任興大社會學系主任）所知者亦如此簡單。南京中大早被易名為「南京大學」，校本部遷往原金陵大學，成賢街的校舍則改為工學院，這都是近年來中大前訓導長（臺灣師大文學院院長任內退休）旅居紐約的沙學浚老師所告知。慚愧的是民國卅八年六、七月我投奔廣州，中山大學已不收轉學生，繼而我投考南遷的政大寄讀，該校却未設社會學系，等來寶島有幸服務於師大的前身師範學院，在四十一年報考臺大寄讀，仍然只有政治學系，第二年「畢業」，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發證明，內文有「俟該校恢復後再行核發證書」，但中大迄今僅有理工、文三學院，卅年來「無師可承」，「無系可托」，徘徊在「社會與政治之間」，惟堪告慰於恩師者，在教學之餘，以與社會學家（尤其是系友學長）為友，又以作中國社會學者為榮，經常從事社會、文化研究，撰文建言，每念受教於孫老師時的情景，總會感念不能自己。